

道德人格研究：范式与分歧

喻丰^{1,2} 彭凯平^{1,2} 董蕊¹ 柴方圆¹ 韩婷婷³

(¹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94720 USA)

(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道德人格研究领域与美德伦理学近来交汇于社会心理学。而这些研究基本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 即结构—过程与观察者—行动者。这两个维度区分出四种研究范式, 即道德原型范式、道德榜样范式、道德信息加工范式和美德民众概念范式。这四种范式发现, 无论是结构或者动力, 道德人格都有其独特性。且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行动者视角, 道德人格者都和普通人不同。道德人格甚至整个人格观趋待整合, 并需要解决特质与情境、结构与动力、理性与直觉、描述与规范等理论问题, 方能更好地指导道德人格或美德研究。

关键词 道德人格; 美德; 道德榜样; 原型; 道德特质; 信息加工; 民众心理学

分类号 B849:C91; B848

1 引言

每一个社会都弘扬道德模范, 弘扬也许意味着社会的道德水平并非完美。在如此强调生存和繁衍的人类进化过程中, 善似乎远不如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在灰暗现实下展示出的人类图景中, 理想的善良社会似乎总是会被穷凶极恶的暴行所击溃。而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在这样的信息时代中总是可以终日不绝于耳。它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它使得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变得没那么积极。研究者发现, 家庭关系中的一件消极事情总是需要至少五件或者八件积极事情方能抵消其影响(Gottman, Gottman, & DeClaire, 2006)。也许是进化过程中对生存的过度关注, 使得我们会对威胁自己的事情产生更多的注意, 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喻丰, 郭永玉, 2009)。坏的情绪弥散终日, 而好的心情却转瞬即逝(Baumeister, Bratslavsky, Finkenauer, & Vohs, 2001)。我们很容易讨厌一个人, 对他形成坏的刻板印象; 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信任一个人(Hamilton & Zanna, 1972)。因此我们对不道德行为的关注似乎也要大过道德行为,

因为相比于追求一个正面的自我形象,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避免一个负面的自我形象(Baumeister et al., 2001)。也就是说在做个好人与不做坏人之间, 我们首先选择后者。

但是即便如此, 对于每天都会撒谎的我们来说(Feldman, 2009), 对英雄的崇拜和对道德人物的追寻却始终没有停息(Goethals & Allison, 2012)。即使是原始人类, 也会崇拜动物图腾, 并将它们拟人化和道德化。在不同的文化里, 超级英雄不断出现在电影中, 各种现实道德模范也不时因为他们的道德行为受到表彰。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经常做出道德行为? 人往往会有种直觉, 将道德行为的原因归因于内(Ross, 1977)。因此, 人格心理学领域的道德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道德人格是人格概念的子集, 是具有道德色彩的人格。人格存在不同的层面, 不同研究者提出不同的分类。如将人格这一概念的层面分为倾向性的人格特征、动力性的个人关注以及发展性的人生叙事(McAdams & Pals, 2006), 或者将整个人格系统及其影响因素分为基本倾向、特征性适应、自我概念、客观传记及外部因素(McCrae & Costa, 2008)。严格来说, 人格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与人格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层面并不是一回事。比较常见的人格研究层面也包括描述、动力

收稿日期: 2013-05-17

通讯作者: 彭凯平, E-mail: pengkp@tsinghua.edu.cn

与发展(Clouinger, 2009); 或将研究的层面分为界定人格系统、描述人格成分、理解人格组织以及追踪人格发展(Mayer, 2005)。抛开发展性的人格研究, 在某一个横断面上, 人格至少包括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 这是人格的“所有”和“所为”(Cantor, 1990)。道德人格研究也不例外, 抛开发展研究, 人格心理学家对道德人格的研究也可以用结构和过程这一分类来区分。

而我们提出, 在道德人格的研究中, 除去结构和过程这一维度, 还存在观察者—行动者维度。也就是说, 无论在结构还是过程维度上, 都存在两种研究范式, 第一种范式以观察者的视角研究人们认为道德人格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在一种常识性的民众心理学水平上, 人们是如何来看待道德人格的。第二种范式以行动者的视角来看待道德人格, 即研究具有道德人格的人其特质和加工过程。

因此, 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道德研究的四种范式, 如下图所示。当然这一区分是为了组织的需要, 四种范式之间并不绝对。道德原型范式与道德榜样范式, 特别是道德榜样范式并非不能了解人格过程, 但它们更多关注人格结构。而道德民众概念和道德信息加工范式在目前研究的水平上主要探讨了道德人格的过程。



图 1 道德人格研究的四种范式

2 道德人格研究的范式

2.1 道德原型

道德原型(moral prototype)取向研究人们是如何看到道德人格结构和道德特质的, 它的主要方式是让人们们对道德榜样或者道德特质进行某种评定、组合与排列, 以便在常识水平得到道德人格

的特点及稳定结构。

Walker 和 Pitts (1998)让 120 名包含老年、中年以及青年的成年人分别自由列出具有高道德水准、高宗教信仰以及高灵性的人的品质或者属性, 分别得到 91 个道德属性以及 110 个宗教属性以及 110 个灵性属性。接着研究者让另 120 名成年人评价一个高道德水准、高宗教信仰以及高灵性的人在这些属性上的匹配程度。结果发现, 公正等 42 个属性仅仅被用来描述高道德水准的人, 传统等 50 个属性仅仅被用来描述高宗教信仰的人, 而安宁等 55 个属性仅仅被用来描述高灵性的人; 同时也包含刻苦等 17 个被高道德和高宗教者共享的属性, 诚实等 12 个被高道德和高灵性者共享的属性, 虔诚等 23 个被高道德和高灵性者共享的属性, 以及关怀等 20 个被三者都共享的属性 (Walker & Pitts, 1998)。接着 180 名本科生对其中评分最接近原型的 50 个属性进行分类, 这些属性被印制在卡片上, 而被试被要求进行尽可能少的分类。聚类分析结果发现, 高道德水准的属性被聚成 6 个维度, 分别为: 原则—理想主义(principled-idealistic)、依赖—忠诚(dependable-loyal)、正直(has integrity)、关怀—可信赖(caring-trustworthy)、公正(fair)以及自信(confident)。多维标度发现, 这些属性可以归为两个维度, 分别是自我—他人、内部—外部, 整个原型水平上的道德属性分布如图 1。同时, 宗教、灵性也会聚类出不同的类别。

Walker 与 Hennig (2004)深化了这种研究范式, 接着在道德原型中继续进行挖掘。他们用同样的范式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别的高道德水准的人: 即勇敢、关怀和公正。Walker 与 Hennig (2004)区分了这三种人各自不同的道德属性分布并在 Wiggins (2003)的人格环形模型(circumplex model of personality)上比较了三者之间的区别。其中, 描述公正者的词汇可以被聚合成 5 类: 理性、公平、尽责、诚实和讲原则; 描述勇敢者的词汇可以被聚合成 5 类: 奉献、有信心、自我牺牲、英雄主义和无畏; 描述关怀者的词汇可以被聚合成 3 类: 利他、爱与共情、诚实与依赖(Walker & Hennig, 2004)。

Lapsley 与 Lasky (2001)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但他们同时考察了这些道德原型的效度, 即道德原型是如何影响人们实际的认知加工过程的。首先, 他们让人们自由联想, 罗列出那些“好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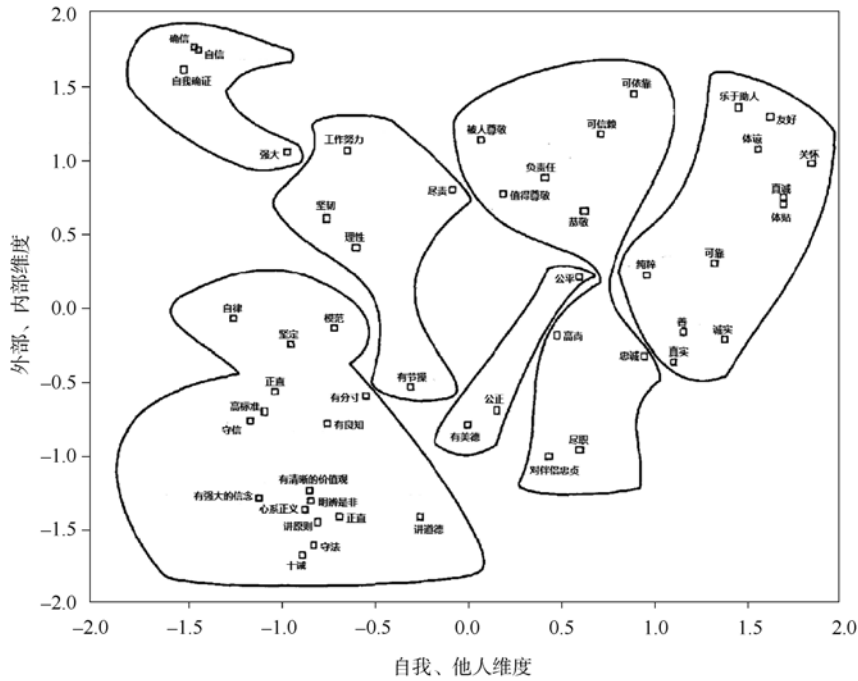


图 2 原型水平道德属性在两水平上的分布(资料来源：Walker & Pitts, 1998)

的特征或者属性；接着，他们让人们对这些特征或者属性进行简单的评定，即它们分别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描述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并通过这样的方法选择评定得分最高的 20 个词汇作为美德中心词汇，选择 20 个评定得分最低的词汇作为美德边缘词汇(Lapsley & Lasky, 2001)。接下来，Lapsley 和 Lasky (2001)让人们用 20 个描述来形容一个人，这 20 个描述里包含 10 个美德中心词汇和 10 个美德边缘词汇，实验参与者的任务是记忆这些词汇并进行再认，再认的词汇包括之前得到的所有美德中心词汇和美德边缘词汇，结果发现，对比美德边缘词汇，人们在再认时会更多地再认出那些没有出现在记忆任务中的美德中心词汇。这表明，人们的道德人格原型确实是在影响他们的信息加工过程，当启动了与道德人格有关的概念时，这些道德原型更容易被激活。

不难看出，道德人格的原型取向首先意在找出道德人格分类的结构，并表明这些结构能影响到人格过程。寻觅稳定的人格分类是人格心理学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而在已被普遍接受的人格大五(Big Five Personality)分类上，除去特质原型取向的研究，至少还有理论取向和因素分析的词汇学取向两种(John, Naumann, & Soto, 2008)。理

论取向的道德人格或者美德研究为哲学家所钟爱。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所以智、仁、勇就是孔子的道德人格分类；仁和义也是孟子的道德人格分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五常：仁、义、理、智、信。现代学者又将其含义进行了解读，将每一种美德又进行了细分(刘同辉，燕国材，2005)。西方自古以来也有从理论上进行道德人格分类的传统，比如传统的四德：勇气、智慧、公正与节制；基督教的信、望、爱等。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同样列举了诸多具体的美德，如勇敢、慷慨、大方、大度、温和、友善、诚实、机智、羞耻等(Aristotle, 350BC/2003)。也有伦理学家提出将善作为一全德，将公正、平等、人道、自由和幸福作为五主德，将诚实、贵生、自尊、谦虚、勇敢、节制、智慧和中庸作为八达德(王海明，孙英，2011)。以及将德目通过利己、利他、利群、利境等划分(江畅，2011)。心理学家同样有自己的理论探讨。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宣称在理论上找到了 6 种跨文化的美德：即智慧与知识、勇气、仁慈、正义、节制和超越。而 6 种美德对应着 24 种特征性强项，智慧与知识美德中包

括创造力、好奇心、思想开放、爱学习和远见；勇气美德包括勇敢、毅力和诚实；仁慈美德包括爱和善良；正义美德包括公民精神、公正和领导力；节制美德包括宽恕、谦卑、谨慎和自我调节；超越美德包括对美的欣赏、感恩、希望、幽默、灵性。他们对这24种强项进行了大样本的因素分析，发现可以聚合成两个因素，即思维优势(strengths of the head)和情感优势(strengths of the heart)(Park & Peterson, 2010)。其他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分类(Shryack, Steger, Krueger, & Kallie, 2010)。

理论取向的人格结构研究并不基于实证，或者说结果并不是自下而上的，但是词汇学取向的道德人格研究却是完全的数据驱动来寻找道德人格结构的。但我们很难区分出这种方式在维度上是行动者还是观察者，因为很多情况下，结果来自自评量表，而自我评定并自我报告时，自己的角度既是观察者也是行动者。Cawley、Martin和Johnson(2000)从韦氏词典中挑选出140个道德人格形容词，然后将这些形容词编制成问卷条目用以自评，通过因素分析发现，可以抽取4个主成分：即共情(empathy)、有序(order)、智慧(resourcefulness)与沉着(serenity)。也有学者进行了类似的中国化研究，采用形容词核查表的方式，通过因素分析，抽取5个主成分，即诚善仁厚、勤谨务实、机智干练、自立自强和沉稳理性(沐守宽，顾海根，2010)。这两个词汇学研究的结果较为相似，但和理论取向的哲学家、心理学的分类以及原型取向的结果相比却多有不同。若三者结果类似大五人格般可达成一致，那么这一领域研究将得到突破。

2.2 道德榜样

道德榜样(moral exemplar)取向研究作为具有良善道德人格的个体，他们与普通人甚至不道德者相比，具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质，以及认知与行为特点(Walker & Frimer, 2009; Walker, Frimer, & Dunlop, 2012)。

Colby和Damon(1992)访谈了23名被公认的道德榜样，这些道德榜样在选择时遵循这样的标准：他们对其道德理想有持续的承诺；他们有根据道德理想来进行活动的稳定倾向；他们会因为道德价值的缘故而牺牲自我兴趣；他们有鼓励他人进行道德行为的倾向；他们给人谦逊之感。研究发现，这些道德榜样拥有对其信念和行为的确定感；即使在逆境中，他们也能保持积极的态度；他们的道德目标也是与自我信念相联系的(Colby & Damon, 1992; Matsuba & Walker, 2005)。

定感；即使在逆境中，他们也能保持积极的态度；他们的道德目标也是与自我信念相联系的(Colby & Damon, 1992; Matsuba & Walker, 2005)。

Matsuba和Walker(2005)让社会机构提名，选取了40名道德模范，并选取了40名普通人作为对照组。通过结构化访谈，他们发现，对比对照组，这些道德模范确实在人格上表现出了不同：他们在童年期对他人的苦难有更深刻的认识、更少的敌人；他们有更多的自我牺牲以及赎罪性的体验；他们对意识形态理解更深刻、更强调未来的目标以及更关注社会的改善。但是Matsuba和Walker(2005)的研究并未区分不同类型的道德模范。而Hart、Yates、Fegley和Wilson(1995)的研究只关注了那些具有关怀美德的道德模范，对比对照组，他们发现，这些道德模范会用更道德的特质来形容自己，也会更多将父母与理想建构入自己的自我概念，与此同时，其自我概念中也更多地包含着系统化的信念与生活计划，并且这些都与自己的过去自我与将来自我相联系，他们的自我会感到更多的跨时间连续性。

Walker等人在后续研究中也进行了不同美德领域的区分，他们选取了25名加拿大勇敢奖章(Medal of Bravery)和25名加拿大关怀奖(Caring Canadian Award)的获得者以及50名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人生故事访谈并让他们填写一系列特质及目标问卷(Walker & Frimer, 2007)。Walker和Frimer(2007)发现，在人格特质上，这些道德榜样与对照组没有体现出什么区别，但是他们却在一系列叙事性特征上显著不同。道德榜样在能动性(agency)和交流性(communion)两个维度上都有更强烈的动机性主题，亦即，道德榜样能够更好地在挑战和逆境中行动，他们也会采取一种他人取向的观点，并在生活中关注对他人的帮助，如见义勇为的勇敢行为或者是自觉自愿的义务行为。而仔细比较勇敢道德榜样与关怀道德榜样，他们却显示出一些人格结构上的差异，比如他们随和性更强、有更好的传承性动机，更关注长远而持久的他人利益，也更加乐观(Walker & Frimer, 2007)。

在此之后，研究者继续深究了道德榜样与普通人在能动性与交流性这两种主要动机上的区别，并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些区别保证了道德榜样之所以与普通不同的原因。他们认为，这两种动机

相互抵触, 能动性动机朝向自己, 使人寻求自我强化、权力与成就; 而交流性动机朝向他人, 使人寻求自我超越、关怀与善行。这两种动机并不相容且互相抵触。Frimer, Walker, Dunlop, Lee 和 Riches (2011) 让 25 名加拿大关怀奖的获得者作为道德榜样, 让 25 名与之背景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较为匹配者作为对照组进行研究。研究参与者仍旧填写个人奋斗问卷以及接受人生故事访谈, 问卷和访谈结果都被编码成能动性与交流性两个维度。结果发现, 道德榜样不仅在这两个维度上都要好于对照组, 而且他们还能将这两个对立的动机进行整合, 并将之纳入其人格结构(Frimer et al., 2011)。

同时, 运用这批道德榜样的数据, 研究者也用其他方式探寻人格结构。比如他们用 50 名加拿大勇敢奖章及关怀奖获得者的人格特质以及目标问卷的数据加之他们对其人生故事的编码, 进行聚类分析, 发现道德榜样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交流性道德榜样, 他们非常人际导向、具有交流性动机、也有更多关系性与传承性的目标, 比如其中某一交流性道德榜样这样谈到: “如果有人死在急诊室里, 我就会过去。总会有个护士要去告诉死者的家属, 而那个人总是我。我也总会这样做, 我总是会拥抱他的家人, 和他们一起哭。我也会感到很难过, 其他护士不会, 但是我真的会”; 第二类是慎思型道德榜样, 他们深思熟虑、道德发展水平高且能进行良好的道德推理, 他们的生活意义是基于反思与原则的, 他们接纳不同观点并关心自我理解与个人成长, 比如其中某一慎思型道德榜样这样谈到: “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他生活中的大事, 人们的想法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 而看不到另一面。对此, 我们必须宽容。因此无论什么人持有的什么观点都不是完全正确或者错误的, 除非他们存有恶意”; 第三类是普通型道德榜样, 他们在人格结构与动力上都与对照组并无太大区别, 他们更像是受到情境的驱使或压力来进行道德行为的, 比如其中某一普通型道德榜样这样谈到: “我并不期望受害者怎么感谢我, 这无所谓, 我知道他是个酒鬼, 也许明天早晨起来他就压根不记得这事了。但他毕竟是人啊, 如果有救他的机会, 那为什么不试试呢? 这真的没什么, 也不是我计划好的,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也

会尽快跑过去的” (Walker, Frimer, & Dunlop, 2010)。

2.3 道德信息加工

道德榜样研究并未发现具有良好道德人格的道德榜样与普通人在人格结构上存在太大区别, 反倒是不同种类道德榜样间存在一些人格结构上的差异。而道德榜样与普通人的最大差异似乎在于他们的叙事自我以及人格动力上。而道德榜样研究所描绘出的人格动力更多是一种现象学的方式, 而非严格的经验科学方式。道德信息加工(mo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取向则是严格根据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观, 研究具有道德人格的个体在编码、储存以及提取信息时会与常人有何不同。

Narvaez, Lapsley, Hagele 和 Lasky (2006) 让大学生们用一些特质形容词来描述那些他们喜欢的人、他们讨厌的人、他们寻找的人、他们回避的人以及他们常常遇到的人。如果他们对其中半数人首先列出的这些词汇属于前述的道德原型, 那么这些人就属于道德长期可及性(chronic accessibility)高者, 他们被认为是具有良好的道德信息加工过程的人(Narvaez et al., 2006)。Narvaez 等人(2006)随后让他们进行记忆任务, 比如记住几句模棱两可的话, 类似“教授给他的孩子上美德课”, 在大量记忆之后给他们提示线索让他们进行回忆, 这些线索有特质线索(如: 道德)与语义线索(如: 教师)之分, 结果发现, 那些道德长期可及性高的人相比于道德长期可及性低的人, 在给予有特质线索时能更多地回忆出句子。而在之后的实验者, 道德长期可及性高者在阅读完一些包含了帮助情境和不帮助情境的故事后, 对那些代表着在需要帮助时并未提供帮助的故事主人公的探测刺激反应更快(Narvaez et al., 2006)。

这类研究存在某种程度的循环论证嫌疑, 因为他们将道德原型词汇的可及性作为区分道德人格的基础, 而用之区分之后, 再看区分之后的被试在后续道德认知加工上的区别。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这类研究用道德信息加工的区别作为个体差异, 并观察在此差异之下的其他信息加工特点的区别。虽然如此, 但是他们实际的逻辑却是道德人格而不是某种道德加工特点作为一种可以区分个体差异的变量, 其个体有着不同的认知加工方式。这与攻击研究的某些理论如出一辙。比

如攻击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Crick & Dodge, 1994)以及脚本理论(Huesmann, 1988)都认为具有攻击这一人格特质的个体在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时与常人有别。而一些具有极端攻击人格的个体通常也被认为是道德不良的。如果将它们作为道德不良的个体与正常人进行比较,同样也能在这些信息加工特征上找到差别(喻丰, 郭永玉, 2009)。

一系列研究发现,罪犯作为一种极端的攻击者,以及普遍意义上的道德不良者,他们在注意加工上存在着差异(Smith & Waterman, 2003, 2004, 2005)。如同时给他们在左右视野呈现一个攻击词与一个中性词,他们会在探测刺激出现在攻击词一侧时反应更快,而普通人则不会(Yu & Peng, 2013)。而这种效应的产生并非出现在认知加工过程的一开始,在认知过程的最开端,这些道德不良者会首先将情境进行自动化地解释,他们会将面临的情境解释为是攻击的或者不道德的,然后再去注意那些和他们解释不同的词,比如中性词(喻丰, 2010)。这种解释上的差异与 Narvaez 等人(2006)所谓的道德长期可及性类似,这些人都会将情境用一种道德或者非道德的方式来解释,而不是像普通人一样看待世界。

2.4 道德民众概念

最后一种道德人格研究范式关注道德人格,亦即美德,在民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水平上其实质如何。美德的民众概念(folk concept of virtue)取向研究人们在民众心理学水平上,是如何看待具有美德或者道德人格的个体及其社会认知过程的。进行民众心理学水平的探究能使我们得到关于美德的一些朴素看法,这些看法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这是实验哲学与实验伦理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彭凯平, 喻丰, 柏阳, 2011)。

研究发现,在人们的直觉上,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美德,首先的线索便是行为的效价。研究中,研究者让不同的人阅读一些不同情境,如:“李明下班回家途中发现一处房屋起火,他不假思索地/思虑再三还是去救了火”,结果发现,无论情境中的个体第一反应是战是逃,人们都会认为他们是具有美德的,且对他们的美德判断并无显著差异;而若同时呈现这两种情境给人,让人们判断哪个更有美德,人们则会倾向于认为那些不假思索去救火的人比思虑再三去救火的人更具有美德(Yu & Peng, 2013)。这表明人们在民众概念

上对美德的判断是和思维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或许在民众心理学水平上,人们认为那些用第一思维系统做出道德行为的人要比第二思维系统作为道德行为的人要更具有美德。接着研究者考察了这两类思维系统的不同特点对美德判断的影响,如时间快慢、意识水平、控制程度、情绪反应等因素,发现,在被试间水平,人们对美德的判断非常粗糙,他们只关心是否进行了好的行为,只要有好的行为,人们就会认为行为的主体是有美德的;而在被试内实验时,人们会对这一判断进行更精细的加工,认为通过第一思维系统做出道德行为的人比通过第二思维系统做出道德行为的人更加具有美德,而通过第一思维系统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比通过第二思维系统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更不道德(Yu & Peng, 2013)。

也就是说,在民众心理学水平上,具有道德人格的人他们的加工过程要更倾向第一系统思维。这和亚里士多德通过其自己的直觉分析建立的美德理论类似,他将人分为有美德者、节制者、无节制者和恶德者四种(Aristotle, 350BC/2003)。节制者与无节制者其思维过程中包含着冲突、需要努力、有意识参与也需要控制,这类似通过第二思维系统做出善行与恶行的人;而美德者与恶德者其思维过程则非常和谐、不需要努力、没有意识参与也是自动化进行的,这类似通过第一思维系统做出善行与恶行的人。

3 道德人格研究的分歧

从道德人格研究的不同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各种研究层面就如不同的人格理论一样,都是用一种盲人摸象的方式来对待道德人格这头大象。道德原型取向类似人格特质论,强调人格的基本结构;道德榜样取向更偏向现象学与心理动力学的人格观,虽然他们试图探讨人格结构,但最终他们所谓的结构却偏向于动机、目标、叙事等人格构念;道德信息加工取向类似人格的认知理论特别是信息加工理论,用纯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方法来讨论道德人格问题;而道德民众概念取向则是用一种糅合了社会认知观的实验哲学方式来探讨基于自然主义观的哲学伦理学概念。各种取向对道德人格的理解实际上各执一词,其研究对象虽都叫做道德人格或者美德,但是它们似乎探讨的并不是一个问题。这涉及到对道德人格或

者美德概念的深层理解, 以及如何将这些分散的道德人格研究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 至少应能解释有关道德人格概念的诸多分歧。

3.1 特质与情境

道德人格面临最大的挑战便来自于情境。事实上, 在伦理学界, 美德这一概念自从其在规范伦理学界复兴之后, 便面临情境主义(situationism)的质疑(Alfano, 2013b)。情境主义认为人们的天然心理局限使之高估了人格的力量以及低估了情境的力量(喻丰, 彭凯平, 2013)。这场争论实际上就是心理学中人—情境之争(person-situation debate)的翻版。用 Walter Mischel 对人格特质论的批驳我们同样可以批判道德人格尤其是道德原型取向的研究, 而用人格心理学家对情境力量的回应, 我们也可以同样回应情境主义的质疑(Funder & Ozer, 1983)。毋庸讳言, 情境对道德人格的影响并非不存在, 近期诸多研究证明了即使微笑的情境变化, 人们的道德判断或者行为都会随之变化(彭凯平, 喻丰, 2012)。譬如, 喝了瑞典苦茶的人比喝了甜的水果混合饮料或白开水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厌恶情绪, 他们也会做出更严苛的道德判断, 认为他人所犯的错误会更加严重(Meier, Moeller, Riemer-Peltz, & Robinson, 2012)。而当人们处于撒了橘子香味空气清新剂的房间内, 他们会更信任他人, 更多地捐款(Liljenquist, Zhong, & Galinsky, 2010)。事实上, 人格理论甚至是特质理论也并不一定排斥情境, 譬如对人格心理学最初发起攻击的 Mischel 自己也建构了一种包含情境的认知情感人格系统(Cognitive 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 CAPS) (Mischel & Shoda, 2008)。而其认知—情感单元, 尤其是 if...than...的行为脚本, 其实质类似行为主义的 S-R 联接, 也类似一种情境性特质(喻丰, 彭凯平, 韩婷婷, 柏阳, 柴方圆, 2012)。反对美德的情境主义伦理学家 John Doris 也同样提出了一种情境性特质, 这种人格结构要求将情境尽可能细化, 它是一种特定情境对应的行为反应(Doris, 2002)。但实际上, 将情境无限制细化同样会损失掉美德或者是道德人格作为一种行为预测源的作用, 甚至会使得这一概念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这种特质是一次性的, 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面临外在条件一模一样的情境。因此, 也有心理学家提出将情境进行类似大五人格式的分类并作出了尝试(Sherman, Nave, & Funder, 2010; Funder,

Guillaume, Kumagai, Kawamoto, & Sato, 2012)。只是这种分类目前为止尚是普遍化的, 尚未深入到道德领域。

3.2 结构与动力

很明显, 道德人格研究中最重要区别便是研究人格的结构和动力。这是从人格心理学创之初, Gordon Allport 与 Henry Murry 两位创始人开创的两种不同传统, 即个人记叙研究与共同规律研究而来。当然, McAdams (McAdams & Pals, 2006)把叙事当作一个独立于结构和动力的单独层面, 但是从某种方面来说, 它整合于一种动力性的自我, 也表现为一种存储结构。道德榜样研究更多遵循个人记叙的研究传统, 至少其研究结果更多地强调人们与所有人都不同(like no others)的那一方面, 而其他取向的道德人格研究则遵循共同规律传统, 研究具有道德人格的个体和其他人不同(like some others)的那一方面(Kluckhohn & Murray, 1953)。而实际上, 人格过程和人格结构可能并不是那么严格的对立, 它们甚至可以共存在一个框架内, 也就是说结构可以通过过程来体现, 人格特质可以通过一系列人格过程来体现(Hampson, 2012)。比如神经质这样一个人格特质它通常通过消极情绪这样的过程来体现, 外向性这样一个人格特质它通常通过积极情绪这样的过程来体现, 而与道德最为相关的尽责性这样一个人格特质则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过程来体现(Hampson, 2012)。这只是一个表明人格结构可以通过过程来体现的例证, 而尽责性这样的人格特质是否必须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过程来显现, 这是存在疑感的(喻丰等, 2012)。

3.3 理性与直觉

发展心理学家强调理性在道德人格发展中的作用, 而在渐渐兴起的社会心理学领域, 道德人格则与直觉过程紧密相联(Narvaez, 2010; Haidt, 2012)。有关道德理性和道德直觉的争论尚无定论(喻丰, 彭凯平, 韩婷婷, 柴方圆, 柏阳, 2011)。但和道德民众概念的研究类似, 人们普遍意义上认为, 道德人格是也理应是建立在直觉过程中(Yu & Peng, 2013)。也就是说, 理想状况下, 一个具有美德的人, 他在做出道德行为时, 必然像亚里士多德所假设的那样, 是心理和谐毫无冲突的, 他们会快速、无意识也毫不费力地做出良善行为, 他们不需要花费自己的认知资源去克服自己的心

理欲望并减轻自己的紧张状态。如果这是美德或者是道德人格的实质,那么道德人格研究领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整合。各种描述直觉道德过程的理论实际上谈论的更多的是一种信息加工过程,也包括情绪过程,而道德人格研究需要将这些过程整合进人格过程并将之与人格结构相融合。

3.4 描述与规范

哲学家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纯粹具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圣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基本不存在的(Miller, 2009)。所以无论心理学家如何研究,都是徒劳。另有研究者认为美德或者道德人格是个规范性问题,而用描述性的结果去试图了解规范性问题,就是用“是”去揣度“应该”,这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的。但是,如果圣人只是空中楼阁,那么我们的美德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心理学研究至少发现,在是否进行道德行为上,人们至少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结构和过程的个体差异的。因此,无论具有纯粹美德的人是否是虚幻的。我们至少有理由相信,道德人格是存在区别的,这给了我们提升它的希望。同时,虽然美德伦理学是一种规范伦理学,但是并非所有的美德问题都属于这种规范性的美德伦理学范畴,如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同样也不乏美德观,但是其理论也不属于美德伦理学。因此,不管美德是否是一种规范,我们都可以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研究美德和道德人格问题(Alfano, 2013a)。

综上所述,道德人格研究哪怕是深入的原型取向,都似乎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并取得学者们的共识。我国学界对道德人格的探讨多以道德教育为主题,而对于道德人格的实证研究则较之略显贫乏。有学者对中国大学生道德人格的特点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学生道德人格的性别差异显著,女生更加与人为善,而大学男生则更为刚正无私,同时,大学生道德人格也是道德行为的有效预测源(王云强,郭本禹,2011)。对于道德原型取向,我国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的实证探索(沐守宽,顾海根,2010),对于道德榜样取向的研究,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介绍(王云强,郭本禹,2009),但尚未有实证研究出现,其他两个研究取向则值得我国学者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江畅。(2011)。论德性的项目及其类型。《哲学研究》,(5),

77-83。

沐守宽,顾海根。(2010)。美德形容词评定量表的编制及其信效度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8(3),310-313。

彭凯平,喻丰,柏阳。(2011)。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6),15-25。

彭凯平,喻丰。(2012)。道德的心理物理学:现象、机制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2),28-45。

王海明,孙英。(2011)。《美德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云强,郭本禹。(2009)。当代西方道德人格研究的两类取向。《心理科学进展》,17,784-787。

王云强,郭本禹。(2011)。大学生道德人格特点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34,1436-1440。

燕国材,刘同辉。(2005)。中国古代传统的五因素人格理论。《心理科学》,28,780-783。

喻丰,郭永玉。(2009)。攻击者的注意偏向与归因偏向及其关系。《心理科学进展》,17,821-828。

喻丰。(2010)。攻击者的注意偏向与归因偏向及其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喻丰,彭凯平,韩婷婷,柴方圆,柏阳。(2011)。道德困境之困境:情与理的辩证。《心理科学进展》,19,1702-1712。

喻丰,彭凯平,韩婷婷,柏阳,柴方圆。(2012)。伦理美德的社会及人格心理学分析:道德特质的意义、困惑及解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7,128-139。

喻丰,彭凯平。(2013)。从心理学视角看情境主义与美德伦理学之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1),169-176。

Aristotle. (350BC/2003)。《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Alfano, M. (2013a)。Character as moral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fano, M. (2013b)。Identifying and defending the hard core of virtue ethic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38, 233-360.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Finkenauer, C., & Vohs, K. D. (2001)。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323-370.

Cantor, N. (1990)。From thought to behavior: "having" and "doing"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5, 735-750.

Cawley, M. J., III, Martin, J. E., & Johnson, J. A. (2000)。A virtues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 997-1013.

Cloninger, S. C. (2009) Conceptual issues in personality theory. In P. J. Corr & G. Matthews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y* (pp. 3-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lby, A., & Damon, W. (1992)。*Some do care: Contemporary lives of moral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Crick, N. R., & Dodge, K. A. (1994)。A review and

-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 74–101.
- Doris, J. M. (2002). *Lack of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mor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ttman, J. M., Gottman, J. S., & Declaire, J. (2006). Ten lessons to transform your marriage: America's love lab experts share their strategies for strengthening your relationship.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 Feldman, R. S. (2009). *The liar in your life: The way to truthful relationships*. NY: Twelve.
- Frimer, J. A., Walker, L. J., Dunlop, W. L., Lee, B. H., & Riches, A. (2011). The integration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in moral personality: Evidence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149–163.
- Funder, D. C., & Ozer, D. J. (1983). Behavior as a function of the sit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 107–121.
- Funder, D. C., Guillaume, E., Kumagai, S., Kawamoto, S., & Sato, T. (2012). 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 and the assessment of situations. *Japane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1*, 1–11.
- Haidt, J.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York, NY: Pantheon.
- Hamilton, D. L., & Zanna, M. P. (1972). Differential weighting of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attributes in impression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6*, 204–212.
- Hampson, S. E. (2012). Personality processes: Mechanisms by which personality traits “get outside the sk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3*, 315–319.
- Hart, D., Yates, M., Fegley, S., & Wilson, G. (1995). Moral commitment in inner-city adolescents. In M. Killen & D. Hart (Eds.),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pp. 317–341).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esmann, L. (1988).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14*, 13–24.
- Goethals, G. R., & Allison, S. T. (2012). Making hero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age, competence, and virtu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83–235.
- John, O. P., Naumann, L. P., & Soto, C. J. (2008). Paradigm shift to the integrative big five trait taxonomy: History, measurement, and conceptual issues. In O. P. John, W. Robins, & L. A. Pervi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pp. 114–158).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Kluckhohn, C., & Murray, H. A. (1953). Personality formation: The determinants. In C. Kluckhohn, H. A. Murray, & D. M. Schneider (Eds.), *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 pp. 53–67). New York: Knopf.
- Lapsley, D. K., & Lasky, B. (2001). Prototypic moral character. *Ident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 345–363.
- Liljenquist, K., Zhong, C. B., & Galinsky, A. D. (2010). The smell of virtue: Clean scents promote reciprocity and char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381–383.
- Matsuba, M. K., & Walker, L. J. (2005). Young adult moral exemplars: The making of self through stori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5*, 275–297.
- Mayer, J. D. (2005). A tale of Two Visions: Can a new view of personality help integrate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 294–307.
- McAdams, D. P., & Pals, J. L. (2006). A new Big Fiv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an integrative science of pers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 240–217.
- McCrae, R. R., & Costa, P. T., Jr. (2008). The Five-Factor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O. P. John, R. W. Robins, & L. A. Pervi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pp. 114–158). New York: Guilford.
- Meier, B. P., Moeller, S. K., Riemer-Peltz, M., & Robinson, M. D. (2012). Sweet taste preferences and experiences predict prosocial inferences, personalities, and behavi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163–174.
- Miller, C. B. (2009). Empathy, social psychology, and global helping traits. *Philosophical Studies*, *142*, 247–275.
- Mischel, W., & Shoda, Y. (2008).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tegrating dispositions and processing dynamics within the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In O. P. John, R. W. Robins, & L. A. Pervi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pp. 208–241).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Narvaez, D. (2010). Moral complexity: The fatal attraction of truthin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ture moral functioning.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5*, 163–181.
- Narvaez, D., Lapsley, D. K., Hagele, S., & Lasky, B. (2006). Moral chronicity and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sts of a 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moral person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0*, 966–985.
- Park, N., & Peterson, C. (2010). Does it matter where we live?: The urban psychology of character strength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5*, 535–547.
-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P. (2004).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s, L. (1977).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Distortions in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0*, 173–220.
- Sherman, R. A., Nave, C. S., & Funder, D. C. (2010). Situational similarity and personality predict behavioral consist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 330–343.
- Shryack, J., Steger, M. F., Krueger, R. F., & Kallie, C. S. (2010). The structure of virtu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virt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 714–719.
- Smith, P., & Waterman, M. (2003). Processing bias for aggression words in forensic and nonforensic sampl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 681–701.
- Smith, P., & Waterman, M. (2004). Role of experience in processing bias for aggressive words in forensic and non-forensic populations. *Aggressive Behavior*, *30*, 105–122.
- Smith, P., & Waterman, M. (2005). Sex differences in processing aggression words using the emotional Stroop task. *Aggressive Behavior*, *31*, 271–282.
- Walker, L. J., & Pitts, R. C. (1998). Naturalistic conceptions of moral matu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4*, 403–419.
- Walker, L. J., & Hennig, K. H. (2004). Differing conceptions of moral exemplarity: Just, brave, and car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629–647.
- Walker, L. J., & Frimer, J. A. (2007). Moral personality of brave and caring exempla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845–860.
- Walker, L. J., & Frimer, J. A. (2009). Moral personality exemplified. In D. Narvaez & D. K. Lapsley (Eds.), *Personality, identity, and character: Explorations in moral psychology* (pp. 232–25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L. J., Frimer, J. A., & Dunlop, W. L. (2010). Varieties of moral personality: Beyond the banality of hero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 907–942.
- Walker, L. J., Frimer, J. A., & Dunlop, W. L. (2012). Paradigm assumptions about moral behavior: An empirical battle royal. In M. Mikulincer & P. R. Shav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oralit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good and evil* (pp. 275–292).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Wiggins, J. S. (2003). *Paradigms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Yu, F., & Peng, K. (2013). Virtue, continence, incontinence and vice: Thinking processes and the virtue ethics.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at *the Monist*.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s of Moral Personality

YU Feng^{1,2}; PENG Kaiping^{1,2}; DONG Rui¹; CHAI Fangyuan¹; HAN Tingting³

⁽¹⁾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²⁾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94720, USA

⁽³⁾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Regardless of moral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moral personality and virtue research can be categorized by two dimensions. The first dimension is structure–process,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what” and the “how” of personality, or personality’s “having” and “doing”.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actor–observer,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nature of personality and the folk belief about personality. There are four paradigms according to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 first paradigm is moral prototype approach, which seeks to identify the structure of moral personality based on folk belief. The second paradigm is moral exemplar approach, which aim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moral personality from moral figures. The third paradigm is mo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which seeks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lying real moral or unmoral people. The fourth paradigm is folk virtue concept approach, which seeks to identify the thinking processes underlying virtuous person based on folk beliefs. Four paradigms aims to explore different aspects of mo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moral personality; virtue; moral exemplar; prototype; moral trait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folk psychology